

以私人记忆书写大时代

宋 庄



文学新观察



2013年，一部私叙事的《平如美棠》打动了很多读者。93岁高龄的饶平如为怀念亡妻，5年里，画尽了他与美棠从初识、结婚到生死殊途的60年。300多张画作，18本画册，构建和存留下了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记忆，也记录下了中国人最美、最纯粹的精神世界。对于这部讲述“我俩的故事”的私人化作品如何获得了“中国最美的图书”，被评为年度好书，饶平如有些想不明白：“我年纪这么大了，怎么会突然这么火？我画的写的，都是平凡的小事，天经地义的事情。”

打动读者的作品，也许不是宏大叙事，而是平凡人生命中的琐碎之事。去年，陈希米的《让“死”活下去》也是一部私人化作品。作家史铁生去世后，“写给你”成为陈希米寄托哀思的方式，陈希米以独特的方式书写发自内心的私语，字里行间的缱绻深情，感人至深。另一部《弟弟最后的日子》也是同类图书，周国忠的弟弟周家忠是一个普通工人，40岁时患上了癌症，在生命倒计时日子里，周家忠能够面对死亡，视死如生，除了他的学习和修炼之外，还在于得到亲情的呵护。周家忠一家谱写了一曲亲情的颂歌。此外，阎钢的《美丽的夭亡》表达了对年仅38岁就离开人世的女儿阎荷的思念；周大新的《安魂》，为英年早逝的儿子安魂，为自己伤痛不安的灵魂安魂，这些作品，都以非虚构的写法展示了私人生活的点滴亲情，却获得了高于“私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

以个人性的生活经验看待宏大历史

简单的人，简单的事，唤起读者共鸣的还有很多：《爸爸的木朵》、《小艾，爸爸特别特别想你》、《我是落花生的女儿》等。《我的兄弟王小波》由王小波的胞兄王小平撰写，以零距离的胞兄视野，向我们披露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少年史，带给读者的不仅是关于王小波的往事记忆，而且是关于他们成长年代的一次认真的清理与真实无欺的交代，特别是关于上世纪50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社会百态的种种细节的描述，一代人的成长历程，在书中都有令人惊喜的存真保留，这种出之真实经历的记述，无意中成就了一部民间版的当代中国史。

私人化写作其实一直存在于文学史中，如果开阔其概念，那么日记体小说也应纳入其中。当下出版物中日记体作品有两类，一是历史真实的再现，二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日记体小说。前者强调真实性，后者思想性、艺术性较高，其中名人日记或特殊人物的日记更受欢迎。近些年名人日记的出版也高潮迭起，如《胡适的日记》、《吴宓日记》、《谭其骧日记》、《茅盾日记》等，日记可以更直接地表现作者的生活和内心，比其它文体更有真实性，能无障碍地进入读者心里，使读者有种亲近感。而学人日记在日记中是独具学术文化特色的一类，主要内容在学术方面，以读书、学者交游、学术活动为主，是研究学术史、思想史的第一手资料。

真正引发学界探讨的私人化写作始自20世纪90年代。“告别革命”、“躲避崇高”成为解构过去的新口号；“五四”运动以来的激进主义受到

了批判，文化保守主义得到大力提倡。而这种声音的发出者，恰恰是当年以启蒙为己任的思想者。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文学的写作姿态和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个人化乃至私人化写作代替了群体化和公共化的写作。评论家王纪人认为，“个人化”不应该从贬义上去理解。事实上只要作家不忘自己是时代的一员，那么这种写作姿态和方式倒是更合乎文学的特性。因为它要求作家不在潮流的汹涌中随波逐流，也不以弄潮儿自居，而是保持自我的立场和视角，对人生有独特的体悟和发现，同时也有自己的话语方式；它追求的是与众不同、难以替代的个人文本，而非求大同存小异的集体文本。这种个人化的写作，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初露端倪，如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等人的写作，但与当时文以载道式的政治化写作相比，当然不可能引起全社会的轰动效应。当90年代文学与政治疏离之后，这种个人化的写作姿态和方式才成为普遍的现象，并在创作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文学价值也渐渐地凸现出来。

私人化写作是90年代中期以后在文坛上形成群体化现象，以陈染、林白、徐小斌等人的创作为代表，也称为“个人化写作”。有学者指出，私人化写作是文学创作的趋势，但也有不少人持质疑态度。私人化写作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庸俗的创作倾向，相反，它在强调叙事回归自我生命内在状态、发掘创作主体自身的生命体验上，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60后”与“70后”作家基本上都可以归类于个人化写作这面大旗下。他们以个人性的生活经验看待宏大历史，通过个人性的记忆书写时代的声音。

文学个性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发现

个人属于社会，文学也属于社会。真正的文学个性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个人写作，而是作家个人对生活、对世界的独特发现。那么，私人化写作如何才能与融入时代，成为有价值的作品？“如果你愿意在作品中发出只属于你的自己的声音色彩，你就必须真诚地以自己的全部投身于现实生活，你就必须把自己的个人生活真正

融入整个时代与社会中去。”曾凡认为，写作个人化不等于私人化。而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李朝全更愿意把私人化写作归为“私叙事”。他的论述使这一概念更为宽泛：毕飞宇《苏北少年“堂吉珂德”》讲述了自己少年时期的经历，有关于当年的人、事和各种事物的生动描述，折射出一个特殊时代的鲜明烙印。温立三《怀念父亲》为我们描写了一个天底下最寻常的却又是如此可亲可敬的父亲。籍满田的《晴雨路干湿》讲述了一个迷途知返浪子回头的故事。周涛口述的《追赶自己的鞋子》保留了众多关于特定年代的特殊有趣的记忆，杨晓升、马克燕的《2011，美丽的遗憾——回眸女儿的求学历程》关于女儿当年求学过程的回述也都可以归为“私叙事”。

但是，对于私人化非虚构作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也提出应引起警惕。以2013年报告文学作品为例，何建明认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比较多，比如王宏甲和刘建的《农民：中国一户农民的百年历史》、陈启文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等作品，都有深刻的思想力和表现力，同时文本的探索及报告文学外延更为宽泛，无论是“非虚构”还是“纪实文学”的概念，都属于大的报告文学范畴。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一些所谓“非虚构”作品，写得精彩，其实有虚构的成分，是小说化的“非虚构”，这是报告文学应该严格排斥的。私人化非虚构作品不是报告文学本质，这一点应引起警惕。

意味深长的痛定思痛

——读王宏甲的报告文学新作《非典启示录》

白 烨

对于那些曾经遭际过的巨大灾难，人们往往不愿在过后再去回首。因为那不仅烙有尚未完全痊愈的创伤，而且留有难以愈合的隐痛。但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近期推出的《非典启示录》（海峡书局出版），有意触碰了这个敏感的灾难题材，大张旗鼓地书写了10年前的“非典”，这虽然让人颇感意外，却也自有他的缘由。这个缘由就是他基于“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把灾难变成财富，就是真正的不幸”的理念，认为我们还没有从这样一场灾难中汲取应有的经验与教训，因而“非典”这个令人不堪回首的灾难，还需要在再度回望中去进行深入的反思，从而真正做到化灾难为财富。

读了《非典启示录》，确实让人在重温当年“非典”带来的种种情景与场景的同时，由作者大含细入的文学视角的事件还原，力透纸背的人文角度的问题反思，收获到了有关行业与体制的问题探究，有关人性与人生的内涵追寻等诸多启迪。由此可以说，王宏甲的这次回望“非典”灾难的纪实写作，在变灾难为财富的文学追求上，既是成功的，也是重要的。

相较于反映“非典”的其他报告文学，王宏甲的这部《非典启示录》，在具有全景式的纪实性的同时，明显具有着强烈的文学性。这既表现在他在整体作品的布局与建构上，有一种颇具文学意味的故事性引力，那就是入手便以追寻谁是首个病毒携带者以及追逐“毒王”的行踪，而构成了一种扣人心弦的悬念，使作品读来引人入胜。而在写事与写人并重的同时，作者特别注重勾勒人物的音容笑貌，尤其是描写人物的个人性情，使得作品里不少真实的人物，都在栩栩如生之中，有一定的个性色彩与精神呈现。如那些置身于抗击“非典”第一线因而时时面临风险的医护人员，都有人情与人性的温度，这里有充满激情的护士叶欣，有心系病人的护士李晓红，尤其是那些肩负重任的医学专家们，在娴熟的专业之外也无不个性鲜明，如肖正伦的乐观，蒋彦永的清醒，姜素椿的英勇，钟南山的坚

定，都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甚至那个被冠以“毒王”称谓的黄杏初，也以惴惴不安的内心自责，让人过目难忘。因为作者注重叙事与写人的两相兼顾，作品里“非典”发生与发展的主要脉络，顽强抗击“非典”的医护人员、专家团队和军人队伍，都以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和舍生忘死，铸就了团结协作又相映生辉的英雄群像，也释放出了救死扶伤和先人后己的人道精神。难明其因又难以根治的“非典”，在肆虐数月后悄然退场，背后的力量就是这样的众志成城和赴后继，这是我们战胜一切灾难的坚强意志与伟大力量之所在。

《非典启示录》后三章，从医疗制度的沿革、传统中药的效用和医患关系的现状等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发表的看法，就远远超出了“非典”这样的突发灾难，而具有更为深广的启示性意义。由“非典”袭来的被动迎战，由医患关系的日趋紧张，作者通过事象找内因，透过表象抓本质，无论是对“依靠人民群众，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模式的重新强调，还是对“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等流行观点的严厉质疑，都是直面医疗卫生的当下现状，在一些关节点上谈问题，找病灶。而他在作品里反复提到的“要找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需要从制度上、思想上、情感上找回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更是把问题归结到群众观点，上升到以人为本。这样的结论，看似并不惊人，却相当启发人，那就是人在一切都按经济规律与商业规则办事的过程中，恰恰疏离了人，忽略了人，轻慢了人。究竟是经济为人，还是人为经济？这是《非典启示录》由“非典”事件生发出来的最大启示，也是对当下社会生活运行与发展都不无警策意义的重要启示。

近些年来，文学创作大幅度地走向了多元与多样，使得整体的当代文学在场上颇显凌乱与芜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现实勾连紧密的报告文学，在着力于接地气、扬正气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路释放正能量的报告文学写作中，王宏甲是一直走在前列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的《非典启示录》便是最新的一个例证。

绿色家园 李海波摄

春日山乡

周亚鹰

斑驳的土坯房总能唤起我无限的回忆。

墙是泥箍的，瓦是泥烧的，灶是泥垒的。木质的窗棂缺了一根，断了两根，剩下的已经发黑，那是风吹的雨淋的。门槛被踩踏成月牙形，两头高中间凹，斧痕累累，那是劈柴劈的。门板上的桐油早就褪了，两个门环已经锈迹斑斑，那是岁月蚀的。

墙体的裂隙很多，直的弯的蜿蜒的交叉着，宽缝能够伸进一只手指，可以藏蛇，山里常有的五步蛇就常躲在这里。墙壁有许多许多不深的小洞孔，像小孩的手指那么大的，油菜花开时，蜜蜂们便出来了，它们最喜欢躲藏到这洞孔里。山里人家用木桶制作一个蜂箱，挂在屋檐下，招引蜜蜂前来安家，蜜蜂便在桶里生息，野蜂变成了家蜂，所产的蜂蜜叫做土蜜。由于土蜜的产量不多，因此，土蜜的价钱便涨得很是厉害。

土坯房的门前有一条三尺宽的廊檐，廊里堆满了柴草木墩竹器磨盘春臼什么的，屋檐稍高处可避雨水，于是横架一根老竹或者圆木，悬着高粱大豆萝卜玉米丝瓜还有红辣椒什么的，琳琅满目。大门正对一屏风墙，那是照壁，小时候不知它的功用，大人们说这照壁能抵挡那邪恶鬼和坏运气。长大才知道，这照壁原来大有讲究，其文化根源可深着呢。

屋边是一蓬野竹，笋是一定要挖掉的，不然后院的野竹可劲地繁育，两三年菜地便成了竹园，瞧这几户，肯定迁到山外或长年在打工去了，不然后院怎么就长满了竹子了呢？



探春 李陶撰

土坯房的前面有一片空地，这是晒场，这季节肯定没有稻子可晒。瞧，竹竿上晾的全是衣服。竹叉和横杆上吊晒的是熏肉腊肉咸肉和各种咸鱼干，一股浓烈的熏烟味和腊肉香弥漫在空中。瞧那条大黄狗和小黑狗，懒洋洋地躺在阳光下，眯着眼盯着这些肉，涎着舌头，要不是主人交代它们守着这些肉不让别家的狗和山上的野猫偷吃，那它们老早跑到油菜花地里疯玩去了。那边的石头堆上、矮墙上、断壁上、竹竿上密密麻麻地晾满了抽穗的白菜。

土坯房后面的坡岭上是桃树和梨树，还有梧桐树桐子树等，这个季节，地气转暖，红的桃花白的梨花和远近高低一坨一坨金黄色的油菜花交相辉映，把土坯房映衬得温馨浪漫诗意盎然。路边啃着干草的黄牛也有点兴奋，不时就奔跑几步，不时就抬头哞哞的欢叫几声。山坡上有羊，东几只西几只。

还没到翻耕的时候，稻田里仍然是冬天的模样，稻根密密匝匝地排列着，稻草秆零星散落得到处都是。但生机已经藏不住了，田埂上的草开始返青，茂密枯白的铁莢丛中绿意随风泛现。一群黑色的水鸭组织得很是严密，它们行动一致步调整齐，就像一大片乌云，一忽儿向东飘去，东边的水田便混浊不堪了，一忽儿又齐刷刷

地向西飘去，西边的田埂便留下了无数的掌印。

附近的菜畦，趁着阳光，白菜包菜脚足劲呼啦啦地往上拔节，一夜之间便蹿得老高。大蒜们也不示弱，抽条抽得老长，直至挺不住又耷拉下来。菜心和蒜苗炒腊肉成了这个时节最受欢迎的菜肴。菜畦里的蚯蚓也开始活动，地边蓬勃起一小撮一小撮光滑细长像粉条垒起的泥团，下面准是蚯蚓了，小伙伴们最喜欢用薄竹片去拨弄这些泥团，撬翻它们，便可捉住硕壮的蚯蚓，有时还可能翻挖出一只正在冬眠的青蛙或蛤蟆，那就是大事了，小伙伴们会拿这事炫耀好几天。

山边，路边，屋边，小溪边，停放着不少车子，是山外的人，山外的人越来越多地来到山乡。或许，他们是在城市里闷坏了？或许，他们在大街上找不到野趣了？再或许，他们是想念老家了？反正他们来了，男男女女，花枝招展，嘻嘻哈哈；女人们满田地里寻找野菜，每挖到一棵便要高声宣布一下并蹦跶几下好吃的男女则围着它们一杆晾晒的腊肉熏鱼和腌笋干，商议着把它们买回城里去。

土坯房的老板娘神情恍惚地走了出来，看看天空，看看远方，又看看这些城里的人，撩起围裙擦擦手，自言自语：噢，他们都穿单衣了，是该给点山货，去趟山外了。

诗集《35次平川漫流》蕴涵哲理

由诗联社、作家出版社主办的傅一清诗集《35次平川漫流》作品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与会者认为，傅一清的诗可称其为现代哲理诗，独具气韵，蕴涵着新奇和机智，常有令人惊喜的发现和哲思，并伴有现代意识的自觉和自制。诗人对自己的生活细致观察，深切体验，冷峻思考，加之诗艺上的机巧营造、自然表达，昭示了她驾驭复杂现代生活经验的诗歌才华。

长篇小说《葵花女》弘扬葵花精神

魏玉明创作的长篇小说《葵花女》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葵花女》通过女主人公短暂而平凡的一生，艺术地诠释了坚韧、善良、执著、包容的葵花精神。评论家雷达认为，《葵花女》昭示着作者强烈的道德激情和深切的人性思考，面对逆境、窘境、迫害、疾病甚至死亡，人性的太阳不灭，爱与忠诚、爱与奉献的热力仍然不断使人获得重生，作者满怀激情，塑造了一个如葵花般永远追求太阳光辉的女性形象。

神州

